

我在報館工作，上夜班。下午二時，正熟睡着。

「——哈囉。」

「哈囉，天天，我是畢倫莉斯，我回來了。我吵醒你了嗎？」

「……沒關係，我也應該起來了。」

畢倫莉斯是法裔紐約人，在美國是著名的影評人及電影、錄像節目策劃人。據她自己說，她也是巴黎某某藝術館電影部的選片人（藝術館的名字我忘記了），又因為這藝術館館長的妻子是另一間藝術館負責人的緣故，把她請去選片了。所以她經常游走於兩地，這次她剛從巴黎回來。

放下話筒，耳朵還在嗡嗡響，怎樣也睡不着了。泡了奶茶，坐到窗前，把窗簾拉開，陽光明媚，竟然嚇一跳。剛才跟她說了些什麼呢，實在想不起來了。

她好像是對我最近攝製的錄像帶有興趣，想來看，也許可以送到巴黎去放。跟她約了什麼時間呢，真的忘記了。她上次獲得資助，到中港台跑了三個星期回來，立即成了中港台電影錄像專家。第一次與她見面是在她樓下的咖啡店，她一開口就跟我說，對邊緣文化藝術特別感興趣，因為她作為一個法國女子流落紐約，亦嘗盡被邊緣化之苦。不久我就獲悉美國電影博物館最近舉辦的一個非洲電影節，原來是由錄像專家策劃的。

等一下亞歷西回來，一定會怪我沒把日期記清楚。早上跟她約定時間時，她問：「最近如何？生活好嗎？快樂嗎？」我真的沒睡醒。

「哎，你們中國人，大概是不答這種問題的了。」如果接到這種電話的是你，而對方是那個用兩分鐘作出一個決定，就影響到你下個月是否有能力交租的人，你會怎樣答？

「我很亂……不，我沒睡醒。見面再談吧。」「好，我們見面聊生平。」

這次說要聊生平的見面時間我真的是沒法記起來。亞歷西倒不在乎我錯失了這個名利升級的機會。她大概只會一如以往，怪我做人缺乏誠意，怪我自視過高，不把人——不論相識不相識的——放在眼內。我跟她一起六年了，她一直深信我傲慢驕張，但她亦深信她沒權利要求我改變，所以總是不得不把對我的批評忍下去，有事發生的時候才拿出來講，講到她自己認為沒有權利要求我或者任何人的一——放在眼內。我跟她一起六年了，她一直深信我的——

當時亞歷西在加州藝術學院。在三藩市的咖啡店，她的長髮流在翻開的書頁上。我假裝上廁所，路過她的桌子，偷看她的書，發現是Andre Lorde的詩集，髮絲散在細字上，如一隻豎起的雄性孔雀尾巴。她朝我微笑，說Hi。那天我們聊了一個下午，其中一個題目是Lord與Adrienne Rich的異同。走出咖啡店，

金光燦爛，原來黃昏的光最輝煌。我睜不開眼，亞歷西站在光中晦黯如一個影子。

後來我輾轉來了紐約，跟香港、跟F的關係逐漸淡薄。F無法跟社會系美女宣佈離婚，我無法再行騙，亦不想他離婚。F理解我們的關係為有「太多問題」。我對男女關係中的猜疑、纏索及男性中心無比厭倦，在與亞歷西的長途電話中企圖盡量表達我可以表達的。

這時候我非常想要一名女子，亞歷西就在河的對岸。距離的限制使我們相信我們可以，或者應該一起住了。她畢業後就搬來紐約。我們在拉瓜地亞機場擁抱親吻。她頭髮短得像一個小男生，全數豎起來。我按下去如按在熨斗上。

我早已不大寫作。亞歷西知道我寫東西，從來沒看過，亦沒問。她十二歲從香港來，現在看中文報紙大概能看懂不過四分一。在紐約，我學拍電影、錄映帶，拿了一些獎，在這國家是一個全新的人。

與她一起的最初兩個星期，我惦念亞歷西的時候，總是先想起她的胸。她抱着我，我感到生命的創傷都湧過來又被推開去。我竟然懷疑我跑了老遠來，費了這麼大的勁，供養了另一个人。

作為一名華裔女性，對亞歷西在紐約攝影界來說既是裨益亦是障礙。偶而有畫廊肯賣她的作品，她就特別緊張積極。來了六年，她儲蓄了足夠讓她維生的機會及關係。由於我倆是公認的「夫妻」，這些機會及關係亦直接幫了我，亞歷西在這些方面是慷慨的，那是因为她清楚知道是她在幫我。前天她在朋友的展覽會開幕酒會上，替我介紹一名全國藝術基金會的委員，並提議我遞上錄映帶時，我瞥見亞歷西的雙眼如焦灼的狼，嘴角卻有勝利的微笑，然後說：「那真是好極了！」我微微點頭。

我把臉挨在瓷磚上，冰冷與熾熱爭持着，她會回來嗎？我希望她不回來。我希望我們仍是在書店或

一屁股坐到床上，口裡罵着：「死黑鬼、病黑鬼……」大概又是被她任副手的黑人攝影師欺負了。斗室充滿她的氣味，她喜歡與不喜歡的，迴蕩着，它們渴求可能已經失去了的主人。

鑰匙開門的聲音。我準備微笑，但見她臉色鐵青，酱油、鹽、糖，封好，放入冰箱，想：她不回來，我如何處置冰箱裡這許多食物？如何交下個月的租？斗室充滿她的氣味，她喜歡與不喜歡的，迴蕩着，它們